



古人怎么求雨

在中国文化的认知里,久旱不雨是天谴。帝王惯常避开正殿居于幽室,素服减膳,静思己过,引咎自责,祈天祷地。

北宋淳化二年(991),大旱。太宗赵光义几次求雨不成,三月己巳日终于爆发,下诏臣工:再不下雨,“朕将自焚,以答天谴”;这个自杀求雨法终于让雨神崩溃了,第二日,雨。

农耕社会的帝王,求雨是必修功课。较之赵光义祈雨的气急败坏,北齐文宣帝高洋更加暴躁:天保九年(558)大旱,高洋数次祈雨未果。高洋暴怒之下毁掉了战国水利专家西门豹的祠堂,并发坟冢。然而求雨还是失败了。

祈雨没有时间限定,“无限日,得雨乃止”。明昌三年(1192)大旱,三月丁酉,金章宗命有司

祈雨,未遂;四月甲辰,祈雨于社稷,未遂;丙寅,下诏责躬,未遂;丁卯,复以祈雨,未遂……五月甲戌,祈雨于社稷,此次终于感动上苍,是日,雨。

大旱除了表示天谴,也意味着人间有怨怒。东汉永初二年(108)五月,久旱,于是太后亲临监狱审犯。有一个囚犯为自己申诉,太后查清确属冤屈,将其无罪释放。车驾还宫,还在路上时大雨便从天而降。

除此还有救济贫民、免除劳役求雨法,但很少使用。特别是秦朝,愈是大旱愈征劳役。

古人求雨通常的做法是“未雨绸缪”:每年春天做“雩(yú)祀”祭礼。汉朝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详细介绍了活动流程:选择壬、癸两日,在离城十里处铸坛,坛前架十米的三角架,堆

柴泼油。召集2000名青壮年,每人一个火把,从城里直至求雨坛分十段,每段200人。第一队人喊叫着从城内出发,和第二队会合,依次走下去,最后2000人集合,烧掉三脚架,六个小时后必降雨。

清朝嘉庆元年(1796)四月丁酉,嘉庆与太上皇乾隆组团“祈雨黑龙潭”,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两个皇帝在同一地点求雨的纪录。成果不错,“是日,雨。”

祈雨与降雨究竟存在何种逻辑联系?《荀子》中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也就是说,不祭祀,雨也一样要下。只不过这种认识没有产生影响,中国人求雨如故,诚意十足且深信不疑,并产生了缤纷的文化和故事。

据《新周刊》

“博物馆”一词的由来

中国古籍中本没有“博物馆”这一名词,有的只是“博物”二字,大意就是见多识广,博识多知。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汉书·刘向传》:“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

博物馆(Museum)一词,在国外始自公元前300年左右,源出希腊语的Mouseion,汉语译为“沉思”或“默想”,用以形容供奉专司美术、文艺、音乐等九位女神的神庙。后来欧洲人利用它作为学术研究及文化教育的场所,中世纪逐步发展成为搜集、保存和研究有关历史人文与自然实物,并公开陈列,用来教育人的组织机构。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则出现于17世纪。以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诞生为标志。阿什

莫林博物馆是世界博物馆史上第一个集收藏、陈列、研究为一体的,向公众开放普及文化知识的近代博物馆。

那么,“博物馆”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见于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在介绍英国时说“英吉利又曰英伦,又曰兰顿……兰顿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在介绍美国时也有“设立天文馆、地理馆、博物馆、义学馆”的叙述。而查对《四洲志》的英文原版——英国人慕瑞1836年写的《世界地理大全》,可以发现“博物馆”对应的英文单词就是“Museum”,因此林则徐堪称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博物馆的第一人。

据《太行日报》

康熙为何给朱元璋扫墓?

去过南京明孝陵的人,都会发现朱元璋的墓前,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写着4个大字:治隆唐宋。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对国家的治理,胜过唐宋。写这4个字的,不是别人,是康熙皇帝。

抹黑前朝,抬高当朝,这是多数当朝皇帝的做法。何况,清军入关,夺了大明的江山,满汉之别曾一度令其头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不贬低前朝皇帝,已算难得,怎么还会对朱元璋如此赞誉有加?

其实,若是留意史料上记载的康熙对朱元璋的态度,就不会意外了。康熙6次南巡,每次经过南京,明孝陵是必到的地方。清朝的皇帝,到明朝皇帝的陵园里,已经有点匪夷所思。更令人惊讶的是,康熙每次到明孝陵,必定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康熙六次扫朱元璋之墓,一方面说明,朱元璋确实对明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对历史有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康熙时,满汉的矛盾依旧突出,通过为汉人皇帝扫墓,表示满汉一家,拉拢汉人,这也是康熙稳定统治的一个方法。

据《羊城晚报》

“饭前一支歌”的来历

我军在南征北战时,许多不同编制的军队往往聚在一个灶上吃饭,容易产生抢饭吃的情况,影响内部团结。一位将领看见这种情况,就命令自己部队士兵先唱一支歌,等兄弟部队都打完饭了再去打。后来兄弟部队看到了,也纷纷效仿,慢慢演变成现在饭前一支歌的传统。 据《老年生活报》

联合国里没挂孔子名言

“联合国大厅里悬挂着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网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有些参观过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人也坚持这么说呢?

1953年,美国画家诺曼·洛克威尔出于对联合国伟大使命的敬仰,创作了一幅碳条铅笔画《联合国》。作品的前景是联合国安理会里,苏、英、美三国代表坐在放有各自国家名牌的桌前,画面中间有一面联合国旗,远景是各国人民的形象。这幅画里一共有65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物,每个人的神态都很安详,画风和谐。画家原计划要画成油画,但是后来感到工程太大,半途而废了。联合国前任秘书长潘基文曾经不无感慨地评价这幅画作:“诺曼·洛克威尔的《联合国》和现实中的联合国一样,都是尚未完成的作品。”

1961年,诺曼·洛克威尔本人参照自己八年前的那幅草稿,完成了一幅规模小得多的油画作品《黄金定律》。这幅油画里的人物只有二十几位,原先的联合国

元素淡化了,强调的只是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和谐地在一起。画作的中下部有三行英语金字,翻译过来是一句话:“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

1985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美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幅以《黄金定律》这幅油画为蓝本、重达半吨的马赛克玻璃镶嵌画,作品仍然以《黄金定律》为题,原画上的那句英语也照样保留。《黄金定律》画里的那句英语与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熟悉孔子思想的国人看到这句英语,会自然地认为这句英语就是孔子名言的翻译版本。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孔子的名言是从反面阐述了推己及人的道理,而这句英语是从正面讲的。

在与孔子基本同时代的很多文化里都有相似的劝诫人们做人行事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的利他主义论述。除了儒家思想外,道家思想和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和犹太哲学等都有论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经书里也有相似的说法。 据《文汇报》

溥仪获“特赦”后在植物园当“花工”

1959年12月4日,“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回到北京。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房间,有两位工友与他同住。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城。

1960年2月18日,溥仪正式上班。溥仪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但毕竟身份特殊,因此植物园在他到来之前专门召开会议,向职工通报了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并要求职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不要对外宣传。至于如何称呼溥仪,则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也不妥,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



溥仪在劳动

枝、换盆、嫁接等技术。

植物园尽量给溥仪安排轻活,他不愿意被照顾,说会影响他的改造。按照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分内工作就成,但其他工作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打猪草,还参加了“除四害”活动。不久,植物园成立民兵组织。当时规定45岁以上的干部、职工不必参加,已近55岁的溥仪仍报名参加民兵,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眼镜,参加训练,不怕苦,不怕累。

溥仪在植物园里劳动锻炼了383天,于1961年3月6日离开,此后他多次到植物园看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工友。 据《北京晚报》

唐官员放假发补贴

古代假期最早叫“休沐”,西汉时期就确立了休假制度,据《汉律》记载,“吏员五日一休沐”,就相当于官员每五日可以休息一天。这个休假制度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唐朝永徽三年(652),唐高宗李治将“五日休沐”改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休”,那时官员每十日休假1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

唐朝除了常规假期,每逢春节、冬至、清明各休七天,中秋、夏至分别休三天假,元宵节、中元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休假一天。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除了放假休息,唐代的皇帝还会宴请群臣。唐德宗时期,已经将上巳节等节日赏宴形成了制度,不仅颁布诏令放假,时间上给予保证,而且规定还予以金钱赏赐,让大臣们吃好玩好。

当然,有弛就有张,皇帝给官员放这么多假,还发补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们更好地工作。因此,一旦“上班”了,官员就得尽职尽责,勤勉为政。如果再有懈怠,就会有律法伺候。 据《北京晚报》

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前世今生

1月15日,“中国政府网”宣布了一个大新闻: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这意味着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存在了36年的“特区管理线”成为历史。

深圳、珠海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是相对于粤港、粤澳边境管理线(俗称“一线”)而言。先有深圳经济特区,才有二线。二线的争议,是从特区起名就开始的。

1979年春,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汇报广东要建一个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前身),当时就有人提出,广东如果这样搞,就得在广东边拉一条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以防资本主义的东西入境。随后主张改革的人恰巧从此得到

启发,何不在深圳经济特区拉条线,以保证特区内的改革不受外界干扰。于是90.2公里的深圳二线就这样定下了。

深圳既然是经济特区,就要与非经济特区有所区别。在特区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很多企业享有特殊的政策,同时,很多外资企业的产品不能内销。所以,二线关的设立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迫在眉睫。1985年3月“深圳特区管理线”通过国家验收交付使用,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非深圳户籍人口进入深圳特区时,要查验有无办理边防证。

长期以来,无论是交通、基

础设施等硬件,还是社会治安、文化氛围等软件,关内关外存在不少的差距。拆除二线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2000年6月25日,以国务院体改办特区司负责人为组长的“深圳二线北移调研组”来到深圳,经过一周的调研,得出结论:深圳经济特区二线暂不能撤,因为二线关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二线关依然未撤,使特区一体化的进程受到极大阻碍。

2015年6月,深圳南头检查站和布吉检查站首先开拆,撕开“二线关”的口子。后续16个二线关的拆除,让“二线关”终成一个历史名词。

据《晶报》